

大清留美幼童——洋务运动中被遗忘的译者群体

叶霏云 广州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摘要: 作为中国首批官派的留学生, 留美幼童的命运与中国近代化的进程紧密相连, 也与中国传统翻译观和清朝岭南地区的翻译活动密不可分。本文以幼童在清末民初的译事活动为主线, 以容闳、李鸿章、唐廷枢等人对幼童的影响为辅线, 集中观察以下几个具体问题: 幼童冒险赴美是否受到当时翻译活动的影响? 幼童在留美期间如何培养翻译能力? 幼童回国后为何并且如何从事翻译工作? 幼童的译者身份为何会被遗忘? 在尝试回答上述问题的同时, 本文兼佐证相关史料与文本, 钩沉留美幼童作为译者的身份与困境, 为当今译学研究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 洋务运动; 大清留美幼童; 翻译史; 容闳; 黄开甲; 蔡廷干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873X (2014) 01-0043-06

一、引言

中国近代史进程中, “1861-1901年的洋务运动即是一场近代化运动”(夏东元, 2010:1)。在翻译史研究中, 已有洋务派翻译主张的评述, 认为“尽管洋务运动失败了, 虽然洋务派具有不可救药的局限性与反动性, 但是他们重视翻译、提倡学习外国的见解还是值得肯定的”(陈福康, 2008:81), 而且同文馆和船政学堂的译史研究也不断深入, 唯独对留美幼童这个译者群体似只有定论而无透彻考究。鉴于“这些留学生回国以后, 担任语言翻译工作的必然不在少数, 这也是有待我们今后深入研究的一个领域”(黎难秋, 2002:98), 本文将从翻译研究角度入手, 在分析历史文献的基础上整理留美幼童的译人译事, 并探讨为什么他们一直缺席于中国翻译史。

二、留美始末

(一) 留美缘由

洋务派于1862年起陆续兴办同文三馆和福建船政学堂, 但仍未能满足以洋务自强的需求, 故于1871年提出官派留学生计划。该计划“固属中华创始之举, 抑亦古来未有之事”^①, 受到重重阻挠, 在1872年才最终实现, 并于此后每年接派30名学生, 至1875年完成四批共120名学生赴美。这些学生出洋时是平均年龄只有12岁的男童, 故史称“大清留美幼童”(下文简称“幼童”)。

值得一提的是, “120名幼童广东籍计83人, 约占69%; 粤童中香山籍计39人, 约占全国1/3”(王杰, 2006:2), 其直接原因是留学计划功臣容闳的影响, 间接原因是岭南地区的外贸和翻译历史: 容闳是广东香山人, 而香山邻近澳门和广州, 早有民间通事、买办之人自学夷语与洋人做起买卖谋生。容闳早年入读传教士办的西塾并赴美留学, 也因“通商

而后, 所谓洋务渐趋重要, 吾父母欲先着人鞭, 冀儿子能出人头地, 得一翻译或洋务委员之优缺”(容闳, 1998:67)。容闳1854年在耶鲁大学毕业回国后曾任翻译和买办, 后来向洋务派提出留学计划并得以实行, 并在招生困难之际被派回广东招生。家乡父老也希望其子弟通过学夷语、当翻译、办洋务而“出人头地”, 便同意送子出洋。部分幼童的洋务家庭关系, 更为其被迫召回后谋得发展出路。

(二) 留美学习与中途召回

到达美国后, 容闳安排幼童入住美国人家庭, 幼童很快就克服语言和文化障碍, 与当地学生一起接受美式教育, 各科成绩优秀。在周末和节假日, 幼童必须跟从中文教习刻苦研习国学典籍, 并进行大量的英汉、汉英翻译练习, 留下了大批优秀中英文习作的史料。另外, 清人李圭在1876年参加美国费城世博会期间, 发现当地教育局骄傲地把幼童的习作作为教育成果展出, 且“所著汉文策论, 亦尚通顺。每篇后附洋文数页, 西人阅之, 皆啧啧称赞”(李圭, 1980:15)。可见, 幼童不仅掌握各科知识, 了解美国文化, 还具备良好的双语水平和翻译能力。

但是, 幼童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出现的“西化”行为, 如穿洋装、与女同学跳舞, 甚至入基督教、剪长辫, 引起旧派学人强烈不满, 并不断上奏批评, 使清廷最终在1881年下令“将学生撤回, 量材器使”^②。但幼童中途辍学, 尽管已经考入耶鲁大学等知名学府, 但学艺未精, 且国内舆论早已将其丑化, 他们真的可以被“量材器使”吗?

三、幼童的译事活动及评价

1881年, 前后四批共120名幼童除了少数人早亡、被提前召回或留美不归以外, 其余94名分三批撤回。在处理留学生归国任用的时候, 洋务派没有明

确的分配计划,让幼童受尽苛刻和不公的待遇。当洋务派无法判断如何合理任用人才的时候,便随意地把大部分幼童派到各个洋务实业部门当学徒和打下手,剩下的就去当翻译,而这也是幼童早期从事洋务实业翻译的原因。后来,随着时局转变,部分幼童或发挥其家庭关系力量,或通过洋务重臣的赏识,或互相提携,凭借翻译工作获取晋升、抒发己见、传播先进思想。下文将依据 Pym (2007) 提出的四项研究翻译历史的原则,即社会起因、聚焦译者、交互文化、着眼当前,对幼童作为译者进行个案分析和群体研究,并结合李鸿章、唐廷枢、盛宣怀、袁世凯、容闳等人对幼童翻译工作的影响,梳爬其译事活动,评价其译事特征。

(一) 洋务实业的翻译与洋务派的影响

根据 1942 年美国学者勒法吉整理的《留美幼童文职分配名单》,有 25 名幼童被召回后在各洋务实业任职“文童”,其中包括李鸿章所上奏的“办理翻译、机器、电报、医学、鱼雷、水雷等事”(转引自勒法吉,2006:85-86)。笔者根据现存史料进行统计,初步发现有 18 名曾经在洋务实业从事翻译工作,具体如下:

表一:幼童参加洋务事业的翻译工作

姓名	留美批次	洋务事业的翻译工作
蔡绍基	1	天津道台助理翻译、上海海关翻译、大北电力公司翻译
钟文耀	1	上海水务局翻译、上海海关道台翻译、天津铁道总翻译兼秘书
罗国瑞	1	上海水务局翻译、上海电报局翻译
黄开甲	1	上海水务局翻译、山东道台翻译
黄仲良	1	天津军火机器总局口译员、汉治萍铁政局翻译兼秘书
牛尚周	1	北洋电报学堂电报操作员兼口译员
梁敦彦	1	天津电报学堂英文教习兼电报翻译
刘家照	1	天津外事局翻译
曾恭笃	1	南京政府外事局翻译、津浦铁路局英文秘书
温秉忠	2	上海棉纺织厂翻译、南京和天津外事局翻译
唐国安	2	唐山开平煤矿英文秘书兼翻译
唐元湛	2	上海电报局文童兼翻译
唐绍仪	3	天津电报学堂翻译
唐荣浩	4	山东外事局翻译
沈德耀	4	唐山开平煤矿英文秘书兼翻译
潘斯焯	4	上海棉纺织厂翻译
周传谏	4	京丰铁路英国总工程师金达(C.W.Kinder)的翻译兼助理
周传谔	4	京丰铁路英国总工程师金达(C.W.Kinder)的翻译兼助理

(资料来源于“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四册文献丛书和 Rhoads 的记载等)

表一的翻译经历大部分属于幼童回国后的首份差事或早期工作经历,主要工作地点上海、天津及以北地区,涉及的洋务实业有铁路、矿业、水务、电报、电力、纺织、军火和外事。究其原因,是李鸿章希望幼童成为“职业性工程师”为国服务,而“设法不让这批幼童在中国官场中埋没,或则荒废所学去上海‘洋行’中做买办”(勒法吉,2006:62)。另外,尽管幼童留美期间也有刻苦学习汉语,但更多的是使用英语和粤语,以致幼童在回国之初很不习惯使用汉语。例如,其中一名幼童吴仰曾在给美国友人的信中坦言“听不懂李鸿章的口音”(Rhoads, 2011:183)。因此,李鸿章也希望幼童通过翻译工作“重学汉语”(ibid.),就如当年留美期间通过翻译练习学习英语,但现在学的是汉语。

但是,历史的发展从来不受个人主观意愿所支配。尽管幼童中出现了“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等著名工程师,但外语优势和西学知识让他们有更多的发展空间,特别是部分来自有洋务家庭背景的幼童,回国后子承父业,翻译便成为其工作的一部分。例如,幼童黄仲良的父亲黄道平曾任上海江南制造局锅炉车间的总办,另一幼童黄开甲的父亲黄岳川在潮海关任通事,两人受到家庭影响从事洋务工作,黄开甲更有大量的翻译工作经验,下文将多次提及他。而最突出的例子是来自广东的著名买办:唐廷枢,他的子侄唐荣浩、唐荣俊、唐元湛、唐绍仪、唐国安、唐致尧都是留美幼童。根据汪敬虞(1983)编写的《唐廷枢年谱》,唐廷枢早在幼童留美期间帮助李鸿章集资开办了开平煤矿,设立了上海洋务局,还向李鸿章推荐郑观应办理津沪电报和招商局,可见其办洋务势力之大,关系之广。因此,表一的唐姓幼童在回国之初利用了家族关系,以翻译工作为跳板谋求发展。后来,唐荣浩从山东外事局翻译晋升为局长,唐元湛通过在电报局当翻译而晋升为民国第一任电报总局局长,唐荣俊则接过衣钵任怡和洋行总办。

除了洋务家族关系以外,部分幼童获得洋务重臣的赏识,继续以翻译工作开启仕途。例如,蔡绍基、罗国瑞、黄开甲、朱宝奎曾经担任盛宣怀的翻译和秘书,其中以黄开甲的任期最长。又如,梁如浩、蔡绍基、唐绍仪、吴仲贤、林沛泉、周寿臣后随李鸿章的德国顾问穆德麟(P.G. von Mollendorff)去朝鲜协助建立海关制度,后又随袁世凯办理事务,其中唐绍仪“1885年随袁世凯出使朝鲜,初任帮办税务,旋即调西文翻译,从而开始了两人的政治和私人交往。此后直到1912年,28年之间,袁唐2人,由清政府的下级官吏,而封疆大吏,而部院大臣,而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内阁总统”(骆宝善,1989)。

可见,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Lefevere,

2004:14)。幼童早期在洋务实业翻译工作是洋务派希望其成为技术专家的过渡工作,或者是继承家业操办洋务的起步工作,从业时间不长,对社会影响不大,但让幼童在回国之初解决生计,尽快熟悉中国社会文化和汉语,并为日后发展积累原始资本。

(二) 驻外使团使馆的翻译与同窗的影响

幼童有语言优势和出洋经验,很多都被派遣到国外使馆或随同公使出洋,通过翻译工作进入外交界,其中最为人知的是第四批幼童梁诚。梁诚于1886年随张荫桓公使赴美国,任二等翻译官,后来还以参赞官身份曾出使日本和英国。1902年,出任美、西、秘三国公使,驻美五年,其中最著名的外交成就是促成美国政府退还庚子赔款,为国家争取合法权益。其他幼童也有类似的驻外翻译经历。

表二:幼童参加外交翻译工作

姓名	留美批次	外交翻译工作经历
钟文耀	1	参加华盛顿特区外交工作,任中国使团翻译秘书;驻西班牙马德里代办;驻菲律宾马尼拉总领事
梁敦彦	1	赴欧美等国任大使;代表中国政府与美、英、法、德四国银行谈判粤汉铁路路权
钟进成	1	参加美国领事翻译工作
欧阳庚	1	旧金山领事馆翻译
谭耀勋	1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翻译
陆永泉	1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翻译
吴仲贤	2	驻朝鲜领事;驻日本横滨总领事;驻墨西哥代办
王良登	2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秘书
王凤阶	2	中国驻伦敦使团随员
张祥和	2	在西班牙和秘鲁参加外交工作
苏锐钊	2	在俄国和华盛顿特区工作;在菲律宾马尼拉、新加坡、巴达维亚、旧金山和英国伦敦任总领事;驻日本东京的中国外交使团的秘书
陈佩瑚	2	参加美国领事工作
容揆	2	美国公使馆任翻译多年
梁如浩	3	参加华盛顿会议;1922年与英交涉收回威海卫租借地
唐绍仪	3	参加韩国领事工作,清朝最后十年数度奉命与外国政府周旋谈判
吴其藻	4	驻朝鲜领事多年
刘玉麟	4	驻欧和驻美领事;中国派驻英国圣詹姆斯宫廷的大使

(资料来源于“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四册丛书和 Rhoads 的记载等)

值得注意的是,梁诚出任三国公使后,深知三国交涉事件殷繁,于1903年向朝廷奏报增派驻外人员,当中包括多名昔日同窗的幼童,其中有具体记载的

有以下五人:

表三:驻美使馆、领事馆任职翻译的部分幼童详情

姓名	留美批次	驻外单位	职务	官职
钟文耀	1	驻西班牙使馆	二等参赞官	分省补用知府
陆永泉	1	驻美国纽约领事馆	翻译官	候选知州
欧阳庚	1	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馆	翻译官	江苏补用道
容揆	2	驻美使馆	二等翻译官	候补知县
苏锐钊	2	驻美使馆	三等翻译官	分省补用直隶州知府

(资料来源:《梁诚与近代中国》第145-147页)

“使馆里的参赞、领事、随员、翻译等外交官,一般由公使调聘”,而且“他们的工作直接影响到使馆的工作效率,影响到使馆在美国人及旅美华人中的形象”(梁碧莹,2011:313)。鉴于驻外使馆工作如此重要,加官进爵、薪水颇丰(1907年头等、二等、三等翻译官的月薪分别为400、300、240两银,ibid:296),当梁诚有掌管人事任用之时,他当然起用能胜任翻译与外交工作的同窗手足,特别是当年被清朝召回时留美不归和后期自费重返美国留学定居的“逆子”。前者包括表格中的容揆,他耶鲁大学毕业后,从1893年开始以译员身份任职于驻美使馆,后来不断晋升,直至他1943年去世;另外还有谭耀勋,他也是耶鲁大学毕业后在驻纽约领事馆任翻译,但不久便患病身亡。后者包括上表中的欧阳庚,他后来晋升为旧金山领事馆副领事,并任温哥华领事、巴拿马总领事、驻英公使馆一等秘书及其他外交职务;还有陆永泉,他在驻纽约领事馆任翻译工作期间,在办公室被暗杀。尽管这些幼童违抗清廷命令留居美国,身为朝廷外交官的梁诚并没有远离他们,反而看重他们久居外洋的经验和为华人请命的热忱,以翻译工作为契机,给他们一个发挥才能的平台,以下援引梁诚当年上报擢升容揆为二等翻译官的奏折为例:

再驻美使署三等参赞官容揆,光绪出年充出洋学生,在美国耶鲁大学堂毕业,西学湛深,外交娴熟,在署供差,十有余年,专办洋文文牍,极资得力,限于额缺,致久淹滞,似宜量为拔擢,用示鼓励^③。

换句话说,无论是被召回的还是留美定居的幼童,他们都“熟悉洋务,处事果断,正当年华,似乎正是曾国藩、李鸿章当年希望栽培的人物:熟悉世界,又忠于国家”(胡劲草、钱钢,2010:232),在清末民初的外交战场上互相提携,互相扶持,以翻译为国家作贡献。他们具体的翻译经历散落在各任公使、大使、领事官的私人日志和出洋记录中,有待学界系统的发掘和整理。

(三) 传播先进思想的翻译与维新派的影响

幼童后期的翻译工作主要是受到维新派的影响,致力于传播先进思想和制度,或是晚年从公职退休后,表达个人的政治诉求和文学追求。其中,有多名幼童曾任维新派和革命派的报纸编辑和翻译,包括曾笃恭曾任《北华日报》和《字林西报》编辑、黄开甲曾任《北华捷报》总翻译、丁崇吉曾任职《上海信使报》、容星桥曾任《中国日报》总经理、李恩富曾任《东钞报》中英双语刊编辑,他们的译作尚待学界发掘,而目前有译本可考的有以下三例。

(1) 容闳与黄开甲合译《国家银行法》

1896年,黄开甲与容闳翻译了《国家银行法》,“这是国人所译最早的国家银行法著作”(程霖,1999:11)。这时候的容闳,已经不再是洋务派的幕僚,而是参加了康梁的维新运动,后来还支持孙中山的主张,可见其政治思想不断演变,但唯一不变的是他对国家的满腔热情。具体而言,容闳自1883到1895年一直留居美国,与中国政府几乎断绝一切来往。1895年中国与日本开战,他极为关心,向张之洞提出向英国银行贷款一千五百万美金备战,购买新式武器,并自愿提出去英国洽商此笔贷款。张之洞接纳他的意见,但英国银行坚持由中国海关收入作抵押,故贷款未成。容闳并不放弃,且萌生了翻译美国银行法律的念头。

根据容闳的记录,翻译目的在于“拟游说中央政府,于北京设立一国家银行”,且“因欲为此条陈之预备,乃先将国家银行律及其他有关系之法律,由一八七五年美国订正之法律中译为汉文”(容闳,1998:175)。很明显,是容闳首先提出翻译银行法,但容闳旅美多年,早已习惯英文写作,因此容闳必须找人合译,特别要润色和修改汉语表达,故“并聘一中国文士,助予合译,而当时助予者有黄开甲君”(ibid.)。其中,黄开甲“他的中文文本或许是留美幼童中最为优美的”(胡劲草、钱刚,2010:141),而且有大量翻译工作经验,当然是容闳的最佳人选。

翻译工作一完成,容闳便去北京条陈,曾得到不少官员支持,但中国官吏习惯用政府措施来谋求自利,使该计划终归泡影。在这种情况下,该译本在当时影响有限,但可以证明黄开甲思想开明,赞成容闳的维新主张,并以翻译工作予以支援。该译本也收录于容闳的“国家银行计划”中,值得金融、法律翻译领域的学者仔细研究,本文暂不讨论。

(2) 容尚勤翻译《卑士麦传》

容尚勤,号廉臣,自幼习英文,并在伯父容闳的安排下,与胞弟容尚谦、堂兄弟容揆和容星桥获得官派留美的机会。容尚勤回国前已入读耶鲁大学一年,但因言行举止过于西化而被清廷于1876年1月提前召回。他回国后经历史料记载不多,只知其“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从事教书工作,在广州逝世”(容尚谦,2006:27),但可以推断的是,他受到洋务家族的影响,容易接受西方的观念,特别是容闳和容星桥后期也主张变法和革命,容尚勤自然也受到影响,因此也关心德国的政治局势,并于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去世的同年,译介了其自传,发表在同样是广东籍的维新派领导的报刊《知新报》。

《知新报》于1897年2月22日在澳门创刊,是洋务运动发展到后期的维新派在南方的宣传口舌。该报聘有英、葡、德、法、日等语翻译,梁启超对此评价很高,说“《知新报》之翻译,每月三十元,每日翻两千字,彼中之报,恒足数四五期之用而有余,临时不患窘竭,何其盛也。弟观其所译,未尝有分毫让时务,且时或过之”(梁启超,1986:1856,转引自姜义华,1999:2)。

1898年10月15日和10月25日,第六十八和六十九期的《知新报》连续刊登《卑士麦传》,署名“香山容廉臣译,陈继俨篆述”。文中详细介绍了俾斯麦的家庭背景、生平爱好、教育经历、从政经历与晚年生活,内容丰富,文笔流畅。笔者初步观察,发现翻译方法既有异化,如译介西历时间“德相卑士麦于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七月二十九号卒”(容尚勤,1889/1999:930);又有归化,如沿用清代朝廷官阶表示欧洲政治官衔“普王欲以某太子为储君,议未定,卑相力辅太子,并为之游扬其才德”(ibid.),是极为珍贵的幼童译作,值得进一步考究。

(3) 蔡廷干英译古诗

蔡廷干是“一位多姿多彩的人物”(勒法吉,2006:78),回国早期接受鱼雷训练,后服役于北洋舰队,且避过了中法、中日海战的战火,后来成为袁世凯的密友,政治地位显赫,退休后常居北京及大连,1935年去世。他获得了足够的社会地位和资金来源后,晚年又回到中国传统古典文化中,潜心研究书法和《道德经》,所著《老之老》在学术界获得评价极高。他还用英文翻译古诗120首,于1932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唐诗英韵》,全书包括39首五言诗和83首七言诗,涉及唐宋两个朝代的作品,翻译过程持续近三十年,不仅是首部由中国本土学者

完成的英译中国古典诗集，而且至今仍为英美流行的唐诗译本。

马士奎（2012）根据该诗集的一手材料，做了详细的翻译研究分析，此文不再赘述，仅引孟浩然名作《春眠》及蔡廷干的译文为例：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I slept on spring, unconscious of the dawn,

When songs of birds were heard on every lawn;

At night came sounds of rain and wind that blew,

How many a blossom fell there no one knew.

(Ts'ai, 转引自马士奎, 2012)

该诗集还有特殊的翻译背景和明显的政治意图：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列强肆意侵略的对象，蔡廷干希望让世人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改善中国文化在海外的形象。到了诗集出版之时，西方出现经济危机，出现了“东方文化救世论”思潮，庞德等人的汉诗译作引起强烈反响，蔡廷干的译诗刚好切合了目的语社会对中国文化的期待，取得不错的传播效果，不仅满足其对文学和学术的追求，更达成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意图。

四、幼童译者身份被遗忘的原因

1939年，一名幼童在书中回忆留美集体往事时，有一句话道出幼童译者身份被遗忘的主观原因：“在往后的岁月里，当我们为自己在事业上取得的微不足道的成功而感到欣慰时，我们很少去谈及早年奋斗的艰辛。这是我们之间极力避免谈及的话题，因为回忆起来实在太痛苦了”（容尚谦，2006:15）。其中，幼童回国早年的谋生经历就包括翻译工作，属于“极力避免谈及的话题”，因此个人记载和回忆甚少，而后期的翻译经历，如洋务重臣的文件、驻外公使日记、各国领馆记录、各大英文报刊等保存下来的史料也很分散。因此，幼童最终以在其他领域的成就被载入史册，而其零星的、过渡的翻译经历则被世人遗忘。

另外，受到中国传统的翻译观的影响，认为翻译是奇技淫巧，不值一提，以致译者地位低下。而且，按照“中国的双线翻译传统”，幼童属于服务于洋务事业的“事务性译者”，而不是著作等身的“文化译者”。前者“翻译目的是在建制内升迁，是建制内的小人物，能见度低，名字不传于世”，而后者“翻译目的是传播新知识，是公众人物，若形象鲜明，对译事的成功很有大帮助”，故“文化译者成为研究焦点，事务性译者不受注意”（孔慧怡，2005：122-124），幼童的译者身份也不被关注。相比之下，同样是官

派留学生，但后期的留日留欧生因为其中有严复、马建忠等“文化译者”，其翻译作品和翻译思想一直受到翻译研究学者的重视。

五、幼童作为译者群体给我们的启示

如果说留学生是中国近代化的报春鸟（陈岱荪、季羨林等，1995），那幼童则是晚清翻译高潮的布道者，值得翻译学界进一步探讨。笔者经过初步研究，不仅钩沉了幼童的译者身份及部分翻译往迹，还发现他们这个译者群体给我们当今译学研究有以下启示。

第一，在翻译史研究方面，学界应该重视“事务性译者”的历史地位，系统地寻找和利用一手资料，具体研究幼童与翻译学科的关系，深入挖掘幼童翻译经历的史实，中肯地评价其译事的贡献。如果把留美幼童的随团翻译曾兰生、邝其照、黄胜等人纳入视野的话，我们对洋务运动期间的翻译史将有更为全面的关照。

第二，在翻译理论研究方面，学界应该使用跨学科的路径，结合幼童留美前后及回国工作后的社会、文化、经济、外事等时代背景来研究其翻译活动，检验并丰富译学理论。如果结合当代中外翻译理论，我们可以考察幼童作为译者的主体性、现代性、翻译动机、赞译关系、源语文化、译入文化等问题。

第三，在翻译培训和翻译市场方面，幼童由于受到落后的人才观和教育观的制约，不能发挥其留学优势，从事翻译工作也是为了暂时维持生计，其译者身份不受到社会的尊重。反观当下，不仅国内有大批翻译培训机构，许多中国学子也走出国门接受翻译培训，而接受其他专业培训的中国留学生更是愈来愈多。这些学生毕业回国后，是否可能遇到幼童们的困境？翻译培训是否与翻译市场的需求接轨？翻译专业的学员与其他专业的留学生在翻译市场上的区分度是否明显？翻译市场是否有足够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让年轻译者发挥所长？以古喻今，这都是值得学界继续探索的问题。

六、结语

本文是笔者近期的一个读书札记，在阅读以上引述的材料之初只是为了研习家乡广东的早期对外交流史，对洋务运动研究也属外行。何况一直以来，留美幼童是中外留学史、教育史、中西交流史的研究对象，而不属于翻译史的范畴，笔者开始的时候也没有从翻译研究角度去提出任何设想。但随着阅读资料愈多，幼童的翻译学习和翻译工作的片段也不断跃然纸上，便逐渐整理出对幼童的译者身份，特别是事

务性译者身份的认识。这不仅是对一个译者群体人物事迹的钩沉,而是要将其重新定位于洋务运动乃至中国早期近代化进程中的尝试,希望引起学界的重视,让他们的贡献不再被中国翻译史界遗忘。

*感谢王友贵教授对本文的批评指正意见,疏漏之处由作者负责。

注 释

- ① 李鸿章《幼童出洋肄业事宜折》,同治十一年正月十九日,《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19卷第7页。
② 《清德宗实录》卷130,光绪七年五月十二日,转引自潘向明,2007。
③ 梁诚《奏为拣员请补参赞领事要缺由》奏折,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初八日,转引自罗香林,226-227。

参 考 文 献

[1] Ts'ai T'ing-kan. *Chinese Poems in English Rhyme*[C].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2. 转引自马士奎、蔡廷干和《唐诗英韵》[J]. 学林漫录, 2012(33).
[2] 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8年.
[3] 陈岱芬、季羨林等. 留学生是中国近代化的报春鸟[J]. 徐州师范学院学报, 1995(2).
[4] 程霖. 近代中国银行制度建设思想研究(1859-1949)[M]. 上海: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9年.
[5] 高宗鲁搜集译注. 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丛书·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M].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6年.
[6] 胡劲草、钱刚. 大清留美幼童记(增订本)[M]. 香港: 中华书局, 2010年.
[7] 姜义华. 《知新报》序言[A]. 知新报[J]. 澳门: 澳门基金会, 1999年.
[8] 孔慧怡. 重写翻译史[M].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 2005年.
[9] 勒法吉原著. 高宗鲁译注. 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丛书·中

国幼童留美史[M].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6年.
[10] 李思富. 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丛书·我的中国童年[M].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6年.
[11] 李圭. 环游地球新录[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年.
[12] 黎雄秋. 中国口译史[M].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02年.
[13] 梁碧莹. 陈兰彬与晚清外交[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1年.
[14] 梁碧莹. 梁诚与近代中国[M].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1年.
[15] 罗香林. 梁诚的出使美国[M]. 香港: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出版社, 1977年.
[16] 骆宝善. 唐绍仪与袁世凯[A]. 唐绍仪研究论文集[C].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9年.
[17] 潘向明. 留美幼童撤回原因考略[J]. 清史研究, 2007(2).
[18] 容闳著. 沈潜、杨增麟评注. 西学东渐记[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年.
[19] 容尚谦著. 王敏若译. 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丛书·创办出洋局及官学生历史[M].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6年.
[20] 容尚勤译. 卑士麦传[A]. 1898. 知新报[C]. 澳门: 澳门基金会, 1999年.
[21] 王杰. “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丛书”序[A]. 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中国幼童留美史[M].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6年.
[22] 汪敬虞. 唐廷枢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年.
[23] 夏东元. 洋务运动史(修订本)[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年.
[24] Lefevere. A.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A Sourcebook*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25] Pym. A. *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7.
[26] Rhoads. J.M. *Stepping Forth into the World: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1872-81* [M].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作者简介] 叶霭云, 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岭南翻译史研究、口译研究。

[作者电子信箱] yecaiyun@gzhu.edu.cn

★☆☆◆◇▲△◆☆☆★☆☆◆◇▲△◆☆☆★☆☆◆◇▲△◆☆☆★☆☆◆◇▲△◆☆☆★☆☆◆◇▲△◆☆☆★☆☆◆◇▲△◆☆☆

第十届全国口译大会暨国际研讨会通知

第十届全国口译大会暨国际研讨会将于2014年10月17-18日在厦门大学召开。本届大会由中国译协和厦门大学联合主办,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厦门大学口译学研究所、厦门大学口笔译资格证书考试中心承办。会议主题: 口译研究: 新视野、新跨越。会议同期将举办第五届海峡两岸口译大赛总决赛等活动, 欢迎关注和热爱口译事业的专家学者、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踊跃提交论文、报名参会。

会议主要议题: 跨学科口译研究; 口译教育; 口译测试; 手语传译; IT技术与口译; 语料库口译研究; 口译服务。请登录大会官网 www.xiadakouyi.com/dahui.html 通过填写网络表单形式提交中英文摘要。论文摘要提交截止时间为2014年4月30日。论文全文提交截止时间为2014年7月30日。大会组委会将对摘要进行匿名评审, 并于2014年9月10日前向通过评审的摘要作者寄发录用通知及邀请函。

大会官方网站: www.xiadakouyi.com/dahui.html 邮箱: kouyi10@xmu.edu.cn QQ: 2769478279 (聋人参会咨询专用)

会议最新动态将通过第十届口译大会专题网站、中国译协网站、厦门大学外文学院网站等通知。

English Abstracts of Major Papers in This Issue

Changing Taboos against Translation: An Explorative and Dialectic Perspective

by *Tan Zaixi*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ong Kong, China) p. 23

Abstract: Despite the fact that tabooing translation has been a well-observed social, cultural and political phenomenon in human existence, it has yet to attract much attention from researcher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make up for the negligence by taking a dialectic view on issues related to the topic. It argues that translational taboos are by nature a phenomenon at once universal and particular, and an existence simultaneously constant and variable. Their universality lies in their existence in all societies where efforts have been made not just to facilitate cross-cultural exchanges but also to curb and inhibit the very same exchanges through government/institutional or translatorial (self) censorship. Their particularity, on the other hand, lies in their tendency to change with time and socio- and culturo-political conditions. The paper calls for the adoption of an open and dialectic attitude towards studying translational taboos, arguing that such an attitude would ensur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ranslation as both a linguistic and a socio- and culturo-political act.

Keywords: taboos on translation; universality; variable features; censorship; translatorial intervention;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translation

An Eco-translatological Perspective on the Supersession of “Translator-centeredness” by “Translator’s Responsibility”

by *Hu Gengshen* (Macao Polytechnic Institute, Macao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p. 29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translator-centeredness” has been developed in two directions: one calls attention to the translator’s domination over the translating process, the other addresses the translator’s responsibility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ranslation ethic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within the ethical framework, we ought to hold translators responsible specifically for coordinating and balancing whatever the translational process involves, including extrinsic or “alien” elements such as the eco-environments for translation, the textual ecologies, and the communal ecologies. Only by taking responsibility for all the “others” involved in translation as well can translators uphold the twin ideals of eco-holism and eco-reason.

Keywords: Eco-Translatology; translator-centeredness; translator’s responsibility; eco-translation; translation ethics

New Developments in Corpus-based Interpreting Studies: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Relevant Chinese and Overseas Literature

by *Chen Jing*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China) & *Fu Rongbo* (Xiamen University & Ningbo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ingbo, China) p. 36

Abstract: The period spanning the past fifteen years (1998-2012) has witnessed a rapid progress of Corpus-based Interpreting Studies (CIS). Drawing on a battery of researches related to CIS during the period, this paper presents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the state of this field in terms of its history, topics, achievements, etc. In addition, we also discuss the problems plaguing the field and its prospects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in an effort to offer some useful points of reference for future researches.

Keywords: corpus; interpreting studies; advance; bibliometric analysis

A Forgotten Group of Early Chinese Translators

by *Ye Aiyun* (Guangzhou University &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China) p.43

Abstract: China’s first-ever government-sponsored students abroad, i.e., those who w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in what has been known as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tended to find their personal careers closely linked not just with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ir country but also with China’s changing conception of translation and especially with the flourishing of translation activities in the Lingnan area. This paper offers an account of the group’s translation practices in the Late Qing and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calling attention to those officials who were most instrumental in steering the returnees’ professional life in this direction, such as Yung Wing, Li Hongzhang, Tang Tingshu. Among the questions that the paper raises and addresses are: Did China’s translation activities during these students’ childhood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their decision to embark on the risky pursuit of Western learning abroad? What new understanding of translation did they acquire during their stay in the U.S.? Why and how did they work as translators after returning to China? Why were their contributions as translators not properly acknowledged? In answering these questions, the paper not only emphasizes the group’s role as translators in pre-modern China and the dilemma they faced in that capacity, but also calls for more reflections on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present era from a historical point of view.

Keywords: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Students; translation history; Yung Wing; Wong Kai Ka; Tsai Ting Kan